Hi 嘉楠，

这些年在国内艺术圈工作和观看到的经历，在机构的相关艺术工作经常会被披上“进化论”的优美外衣，比如：创新、探索精神、独特、勇于提问等等，但实际上那些在机构中被展现出来的，多数只是隔靴搔痒的文字游戏，且在这背后又充斥着对各职能劳动者的剥削。比如讲平等的展览，在那个机构中普通的清洁工人是否有得到“平等”的待遇呢？答案可想而知。

从个体在机构中被定位的角色来看，经常是遭遇劳动及意识形态压迫的。大概除了策展人或者馆长能在其中找到思想、社交碰撞的快感外，其他人基本上都是基础的劳动力（甚至情感）输出。没有那么多友好而开放的艺术家，也没有那么多愿意真心实意交流的策展人。所谓的团队协力，好的情况是可以分担各类行政执行工作，不好的情况是各怀鬼胎的推卸责任。新的知识生产并不存在，本身结构体系已经压制了这种可能。

最近，我和郑宏彬、坚果兄弟他们一同外出，执行“重金属乡村巡演2021”的项目，即看到真实的社会现实（被迫成为废墟的西北农村、官商勾结下被重金属污染致重病的村民……），也体味到另一种共同协作的方式。因为他们以往项目的经历，基本上每次他们都能吸引到不同的媒体、纪录片导演、非艺术类的志愿者、当地村民参与到他们的项目中。这种协作又是区别于点点小组、上阳台圈、副本制作、定海桥的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前者所引入和参与的人是来自于社会各层，而后者们是在同温层的维度在推行一种共同工作（协作）的可能。两者有想通的地方即在于，她们皆不接受指定的、固定的社会结构，并用具体的工作行动来践行自身的理念，并伴随着对于人的尊重。

当然我不认为已经到了需要否定所有机构工作的时机，机构的存在在今天来说依旧可以成为一种推动的力量。比如曾经的泰康、激发研究所、箭厂空间、时代美术馆、曾经的先美术馆、歌德学院等等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如不是她们曾经做的工作，我也不会意识到独立艺术机构、后殖民、东南亚、身份认知等社会和时间维度。

我自身确实还是迷茫的，在6月初结束工作后，我开始进入第四个月的自由职业状态。现实的生活问题我不得不去面对，尽管我会被自由职业所吸引，但依旧处于“惧怕”中。惧怕自己在自由职业中一事无成，无所事事。可能接下来我会找一份工作来维持生活，同时也兼具摸索个人的方向。

相比微信的短信息，我比较喜欢写信。保持联系～

希望你一切安好。

冰煌

2021年9月8日星期三